



“唱新闻”:传统时代两种浙江曲艺的内容偏向

李 乐^{1,2}

(1.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2.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宁波 315211)

摘 要: 在传统时代,浙江曲艺道情和“新闻”在内容上存在偏离中国曲艺主流的地方,这种偏向主要表现为,它们以与地方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具有一定真实性的故事为重要内容。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浙江道情和“新闻”身处竞争性环境当中,必须以其自身特色赢得生存空间,而在其组合性媒介结构中,身体媒介和乐器功能的不足、口语媒介在声腔上的贫乏,都导致口语媒介不得不在内容上增强自己的功能——以具有地方性和真实性的故事取得相较于其他曲种的内容优势。由此来看,竞争性环境和组合性媒介结构是在考察传统曲艺这种传播方式的某些偏向时需要考虑的两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 道情;唱新闻;内容偏向;组合性媒介结构;竞争性环境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1)02-0030-06

Singing "news": The content bias of two kinds of Zhejiang Quyi in traditional times

LI Le^{1,2}

(1.Journalism Schoo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Faculty of liberal Arts and Communi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times, there was the content deviation from the Chinese Quyi mainstream in Zhejiang Quyi by the name of Daoqing and "News". The deviation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act that they took the realistic story as the important content, which had a certain degree of authenticity and was linked to the local society. The reason for the deviation was that in their combined media structure, the body media and the musical instrument were inadequate, and the tone of spoken media was poor, so the spoken media had to strengthen its function in content—the spoken media carried the realistic story which obtained the content 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other kinds of Quyi, thus making them won the living space in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combined media structure and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when examining some biase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Quyi as the way of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Daoqing; singing news; content bias; combined media structur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收稿日期: 2020-04-22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9-29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1批特别资助项目(2018T11033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2批面上资助项目(2017M620127)

作者简介: 李 乐(1980—), 男, 湖北荆门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传播史方面的研究。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传统时代^①，中国曲艺在内容方面通常脱离听众所在的地方社会，但也有一些例外，如，浙江曲艺道情和“新闻”的部分演出作品就来源于本地，并服务于地方。即是说，浙江道情和“新闻”在内容方面存在偏离中国曲艺主流的地方。关于这种偏离发生的原因，学者孙悦湄^[1]在研究宁波象山“新闻”时指出：象山“新闻”的“语言特征（方言）”，是“其传播、交流过程中的主要制约因素。从传播的角度讲，方言是无法突破地域特征的制约的，因而，反映当地最为基层百姓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与物，便成为其内容构成的主要取舍点”。孙悦湄从曲艺本身的角度思考并认为，方言影响内容的选择，而浙江道情和“新闻”使用的都是方言，因此，其研究对本文来说具有启发意义。但在传统时代，并非所有使用方言的曲艺都从本地采集故事素材，如使用方言演唱的宁波走书曲目就与本地无关^{[2]38-49}。所以，仍有必要寻找其他路径来探讨这一问题。

若要进一步探究传统时代浙江道情和“新闻”这类曲艺在内容方面发生偏向的原因，自然容易想到“社会需要论”，但它在解释这个问题上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需要与满足需要，既是一个叙述框架，也是一个有关因果关系的解释框架”^[3]，貌似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如何证明浙江道情、“新闻”在本地取材，就是它们所在地方社会的客观需要？即便这种需要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未必也就是一种必须顺从的驱动力”^[3]。尽管“社会需要论”不足以帮助人们理解浙江道情和“新闻”在内容方面的特殊性，但“社会”仍是研究这个问题时需要考察的重要因素。

基于此，本文拟从社会和曲艺本身两个方面分析浙江道情和“新闻”在内容上发生偏向的原因，具体地说，就是从它们所处的竞争性社会环境和媒介结构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唱新闻”所处的竞争性社会环境

在浙江，道情曾流行于金华、衢州等地（以下简称金衢道情），俗称“唱新闻”；“新闻”曾流行于宁波、舟山等地区（以下简称甬舟“新闻”），也被称为“唱新闻”^{[4]②}。

浙江“唱新闻”，无论是金衢道情，还是甬舟“新闻”，均面临其他地方曲种的竞争压力。如，金华道情清初就在城乡盛行^{[5]859}，而从清初到民国的三百多年间，除道情外，在金华盛行的曲艺还有花鼓、鼓词、小锣书、莲花、说书等众多曲种^[6]。《金华市农业志》^[7]载：“康熙年间，从安徽凤阳传入花鼓，演说戏

文故事。道光十五年（1835）前，鼓词曲艺流入永康农村，后成永康、武义、东阳一带民间曲艺一种。”“义乌一地有86个锣鼓班，均为当地农民组成。每逢迎神赛会、庆贺丰收或逢年过节，均请其演唱。”又如，宁波“新闻”在较为广阔的空间流动演唱，举凡街坊、船埠、车站、墙门、村庄等都是他们的表演场所^{[2]189}。与之相应，便有众多演唱形式：唱门头，即沿门唱几个小曲；楞便场，在居民天井、明堂之中，唱一段或一场；唱航船，即在水网地区的日夜航船中为旅客演唱；唱灯头，即到庙会集市演唱；唱场子，即能唱大书、水平较高的艺人进书场演唱……^{[2]17}。可见，宁波“新闻”艺人主要活跃于基层社会。而在宁波基层社会，存在众多同“新闻”有竞争关系的曲艺：走书和串客常在山乡农村中演唱，评话常在宁波城镇茶坊书场表演，采茶篮逢庙会时表演等^{[2]189}。并且，这些曲种受到了基层群众的热烈欢迎，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对这类娱乐活动的热情也丝毫未减。《宁波大众》^[8]载，1957年春耕准备阶段，宁波新乐乡姜陵村请来一位唱走书的艺人，到2月24日，还在说唱全本郭子仪，每天下午和晚上，都有许多人在听，有的都快成书迷了。金衢道情、甬舟“新闻”所处的竞争性环境，于此可见。

虽然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但金衢道情和甬舟“新闻”却能够在浙江广泛而长久地流行。衢州龙游县文化馆的调查资料显示，从明末清初至民国时期，道情艺人已从第一代延续至第六代^{[9]4-5}。此外，据估计，宁波“新闻”艺人在“文革”前尚有约三四百人^{[2]17}。在竞争性环境当中，必然存在优胜劣汰机制，能够生存下来并取得发展的曲种在媒介功能上必定不输于其他曲种。浙江“唱新闻”广泛而长久的流行说明，它们在媒介功能上与其他曲种处在大致相当的水平或者占有某些优势，而媒介功能与媒介结构存在不可分离的关系。

① 本文所谓“传统时代”主要指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时期。民间文化传统的延续自有其规律，近代史上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对浙江道情和“新闻”的影响甚微，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时期都可以归为它们的“传统时代”。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管控力度加强，浙江道情和“新闻”的传统尽管某种程度上仍在延续，但毕竟受到了政治力量的干预，因此，本文所称的“传统时代”不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时期。

② 由于金衢道情和甬舟“新闻”都被称为“唱新闻”，所以本文在有的地方用加引号的“唱新闻”来统称它们。本文之所以将金衢道情和甬舟“新闻”一起研究，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内容、艺人、乐器、表演空间等方面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二、“唱新闻”的综合性媒介结构

金衢道情艺人表演时多采用单口多角色的坐唱形式,以唱为主、说为辅,用一个情筒和一副筒板作伴奏,一只手拍情筒,另一只手打筒板,筒板间用,无其他乐器伴奏^[4]。甬舟“新闻”的演唱也多由一人采用坐唱的形式进行,演唱时,艺人右手拿鼓杆和打锣木片,左手提一面小铜锣,两个膝盖上放一小鼓,唱曲的同时打锣击鼓^[4]。可以发现,在场的艺人身体、乐器(情筒、筒板、小锣、小鼓)、口语都是作为浙江“唱新闻”的媒介而出现的,三者结合形成了“唱新闻”的综合性媒介结构。

身体在传播研究中一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刘海龙^[10]认为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大多数研究者有一个共识:传播是精神交往及互动,基本和身体无关。第二个,我们对于身体问题有一种理所当然的看法,有点像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德里达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身体的在场。”而按照约翰·奥尼尔^[11]的看法,人类至少拥有生理和交往两种性质的身体。交往身体即介入交往关系的身体,对身体来说,这种介入是必然的,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介入交往关系的身体即为媒介,就此,杨慧琼^[12]指出:“现代化进程已经赋予‘媒介’一词深深的技术特性。身体和媒介似乎没有任何关系,肉身不是电子的,也没有散发铅的气息。然而,不是所有的媒介都是科学技术的产物。人类,茫茫宇宙的幸福生命,他大部分的岁月所使用的主要媒介与现代技术无甚关联,而是深深依赖于人体。”即是说,身体是一种原生性的媒介。由此看来,身体就是媒介,身体媒介这一概念是可以成立的。在面对面的交流中,表情、面容、姿态等身体媒介都极为重要,在以说唱故事为主的曲艺中,就更是如此^[4]。浙江“唱新闻”艺人的身体媒介有其特殊性,从事这项技艺的大多是盲者,由于没有明亮的眼睛,他们在表情的丰富性、面容的光彩、姿态的灵活程度上都不及明眼艺人,这不利于他们增强表情达意的效果^[4]。以姿态为例,“唱新闻”艺人的姿态与宁波走书、宁波评话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宁波走书最初也是一人自拉自唱的“坐唱”;而后有简单的伴奏,演员位于桌子中间后面,乐队坐在桌子横旁,演员限于在桌后唱,动作幅度较小,称为“里走书”;再后,演员与乐队相对各处一旁,演员在台上就有了较大空间可作表演圈,称为“外走书”^{[2]10}。正因为动作幅度比较大,这种曲艺才被以“走书”名之。宁波

评话演出时,艺人手中的一把折扇,既可以比作刀枪,又可拟作笔纸等,不一而足^{[2]19}。而“唱新闻”艺人则一直沿用坐唱,经常“危坐于桌上”^[13],其身体姿态的表现比较有限,与宁波走书和评话相比,难免相形见绌。

乐器方面,尽管浙江“唱新闻”盲艺人在听觉和音乐天赋上并不逊于常人,但由于经常流动演出,加上身体条件的限制,所以他们使用的乐器都颇为简单。金衢道情仅以情筒和筒板作为伴奏乐器,甬舟“新闻”也是如此,只采用一小锣、一小鼓作极为简单的节奏型伴奏。如果将之与其他曲种相比,就更显简易了。旧时,宁波民间流传着一句话:“文书(四明南词)进华堂,武书(宁波评话)进茶坊,走书奔农庄,新闻唱四方。”^{[2]189}四明南词的伴奏形式“至多的时候可以集中三弦、扬琴、二胡、琵琶、凤箫、笙、阮、双清、鼓板等几乎江南丝竹的全堂乐器……它的伴奏音乐是汉族音乐中十分罕见的复调音乐”^{[14]3}。暂且不论经常出入华堂的四明南词,即使是奔走于各个农庄之间的宁波走书,也有四弦胡琴、二胡、月琴、扬琴、琵琶、三弦等作为伴奏之用,其中,四弦胡琴是必不可少的主要乐器^{[2]10}。同样是活动于农村的衢州滩簧,其乐器也有鼓、吹奏乐器及弹拨乐器,其中,仅弹拨乐器就有三弦、琵琶、扬琴、笙等^{[9]6}。显然,在器乐方面,浙江“唱新闻”没有什么特出之处。

至于口语媒介,由于它是说唱艺术的核心,所以需要对其进行更为详尽的分析。口语媒介就其构成而言,可以分为信息物质载体、语言内部结构、信息内容三个部分。首先,在信息的物质载体方面,浙江“唱新闻”与其他曲艺相比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马歇尔·麦克卢汉^[15]说:“如果可以把人耳比做无线电接收机,它可以译解电磁波代码,将其重新编码并还原为声音,那么人的嗓音就可以被比做无线电发射机,它可以把声音转换成电磁波。”他认为,正是人的嗓音把空气和空间塑造成言语模式。言语是声带作用于空气产生的,因此,一切身体在场的口头传播都是以人的声带和空气作为物质基础的。第二,浙江“唱新闻”的语言内部结构与其他曲艺相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曲艺的语言内部结构集中体现在包含文体、乐体、唱腔等要素的声腔上。宁波“新闻”的声腔以新闻调为主,兼用慈调(与四明南词的赋调相似)、悲赋调(与四明南词的慈调相似)^{[2]125}。与宁波“新闻”相比,同在基层社会演唱的宁波走书的声腔则异常丰富,包括四大腔系,即走书腔系(有四平调、马头调),四明南词腔系(有平湖调、赋调、紧赋调、

慈调等),乱弹腔系(有三顿板、快二簧),杂曲小调(多吸收自戏曲)^{[2]108-115}。金华道情的声腔简单、低沉而哀伤,常常夹带缓慢的哭腔,其曲调的旋律中速而下行,很少有高亢、昂扬、强烈之音,它听起来,“如泣如诉,比较原始,未正式形成各种板式,变化亦不多,煞尾时照例有几句散板。”^{[16]269}究其原因,李骅^{[16]269}将其归之于:“旧社会盲艺人生活困苦,沿村卖唱,迹近乞讨,其曲调自然就不免带有哀怨愁苦之音了。”可见,在声腔方面,“唱新闻”并不具备竞争力。

在浙江“唱新闻”的组合性媒介结构(身体-乐器-口语)中,身体媒介的失效,作为辅助媒介的乐器失之过简,口语媒介中的信息物质载体没有特殊性、声腔缺乏竞争力,这些情况必然迫使口语媒介中的信息内容增强自己的功能以弥补整个媒介结构中其他部分的缺失,从而保证“唱新闻”的组合性媒介结构在整体功能上处于较强状态。

三、地方性和真实性:“唱新闻”的内容偏向

在信息内容方面,大多数传统曲艺所唱的通常离不开人们在特殊年代曾批判过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故事和民间传说等。以浙江的几个曲种为例,宁波四明南词的主要曲目有《珍珠塔》《玉蜻蜓》《白蛇传》《十美图》《潘龙镯》《雨雪亭》《果报录》《双珠凤》《西厢记》《四法缘》等。其中,《珍珠塔》讲的是家道中落、后又中状元的河南祥符县秀才方卿与其襄阳表姐陈翠娥的故事;《玉蜻蜓》讲的是尼姑志贞的私生子徐元宰为他人收养,长大后得中状元,与母相认的故事;《双珠凤》讲的是洛阳才子文必正和吏部天官之女、南阳才女霍定金的故事^{[2]30-35}。宁波走书的题材与四明南词类似,如《双珠球》讲的是家道衰落的常州府武进县书生朱求与都察院陈建之女陈美云的故事,《桑园初访》讲的是忠良之后、落难公子何文秀与不爱富贵的官家千金王兰英的故事^{[2]40-45}。衢州滩簧的演唱曲目以明清传奇的折子为主,如《雷峰塔》中的《断桥》《覆钵》《祭塔》,《跃鲤记》中的《芦林相会》《安安送米》,《连环节》中的《貂蝉拜月》等^{[9]5}。金衢道情和甬舟“新闻”身处中国曲艺传统之中,自然不免要唱大多数曲艺都在唱的内容。民国年间的一篇文章曾记述,“唱新闻”艺人“所唱的还是封建色彩极浓时代的落难公子中状元,私托终身后花园,好人遇仙救,坏人遭雷击等事”^[17]。民国年间的另一篇文章也说,“才子佳人式的故事”是他们叙唱的重要内容^[18]。

值得注意的是,金衢道情和甬舟“新闻”在唱述

“才子佳人式的故事”之外,还把地方新闻轶事作为重要题材,而这正是它们与其他曲艺相比呈现出来的内容优势或独特之处。

浙江“唱新闻”多取材于地方新闻轶事,对此,浙江相关地方志有众多记录。如《衢州市曲艺志》^{[9]2}载,“道情多唱地方轶事”;舟山《金塘志》^[19]载,“新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流传于民间的社会新闻,经盲艺人自己加工编演,如《赌博腐化错》《石匠阿三》等”;金华《磐安县文化志》^[20]载,道情的内容“有的是剧本改编,有的是民间故事加工而成,也有就地取材,即兴说唱”。由于取材于当地的新闻轶事,所以浙江“唱新闻”的这部分内容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其一,它与地方社会深度联系在一起。甬舟“新闻”的“书帽子”往往直接宣示故事的发生地。如《拆鸳鸯》的开头:“《拆鸳鸯》出在镇海县灵岩乡,白石庙对落横河街,后桥头横进于家门。”^{[21]290}还有《借珠花》的开头也是如此:“新闻出在新昌城,五里元遥戴家门。”^{[21]306}此外,空间位置通常贯穿于“新闻”故事情节的各个环节,这在“新闻”的保留曲目《三县并审》当中体现得颇为充分。该曲目讲的是:清代武举祝开文家居镇海祝家庄,该庄位于镇海、慈溪、鄞县交界处。祝开文与弟媳通奸,被刚从外地经商回来的侄儿祝元英发现,为了灭口,祝开文暗将侄儿祝元英用绳子勒死,令家仆阿金、阿牛埋尸于鄞县境内,并嫁祸侄媳祝魏氏,指她谋杀亲夫。案发后祝魏氏被打入死牢。其慈溪娘家兄弟不服为之鸣冤。由于死者尸体葬于鄞县,若要开棺验尸,需经鄞县办理,故又引起三县并审此案。后经鄞县县令微服私访,查出真情,武举祝开文伏法^{[2]66}。

令人饶有兴味的是,许多金华道情曲目的具体来源地,在当代撰写的方志和文章当中仍能被清楚地记录。《金华县续志》^{[5]859}上记有:“岭下朱的《朱阿顺抢亲》,城区游宅街的《尼姑记》,盐埠头的《贩桔记》,雅畈的《失尸案》等。”《金华道情漫谈》^{[16]263}一文载:“《金镯记》的故事发生在城里的南市街,《跑马记》发生在西市街,《双狮子》发生在莲花井,《脱鞋记》发生在鼓楼前,《银袋记》发生在上浮桥,《骨头记》发生在拦路井,《借伞记》《拾银记》等发生在义乌,《茶商记》《狗报记》等发生在兰溪,《旱灾记》(一名《金蝴蝶》)等发生在浦江。”时隔许多年之后,这些道情曲目的所属地仍能被明确指认,正说明道情带有深刻的地方烙印。

其二,它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来源于就地所取之材带有真人真事的痕迹。金衢道

情和甬舟“新闻”的材料有相当比例来自衙门审判的案例。清朝光绪年间,金华城区鼓楼里有一位道情艺人,名叫戎裘,他专将衙门审理的案件编成故事演唱,教过10多个徒弟^{[5]859}。另外,新中国成立之后,据金华道情艺人施小荣回忆,他的师父和衙门书吏交朋友,用得来的案件审讯口供和案情始末编过一些道情曲目,如《双珠花》(又名《朱阿顺抢亲》)是根据清代发生在金华岭下朱和上王(两村相隔五华里)朱王两姓因婚姻纠纷引起的一桩大案编成的,当时称之为“金华大新闻”,哄传一时^{[16]264}。民刑案件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地方轶事。如金华前洪村胡姓一家因经营货郎担发家的事迹,就被道情艺人编成一本《络头记》演唱,因内容涉及村中几个头面人物和胡家子弟,有褒有贬,所以这个曲目避而不在前洪村演唱^[22]。另有抗日战争胜利后,金华城区附近的道情艺人把浦江沦陷期间日伪凶恶残暴、卑鄙无耻的行为以及他们之间钩心斗角的事实编成曲目,表演得淋漓尽致^[23]。

曲目内容引起的纠纷也能从一个侧面证明“唱新闻”内容的真实性。1900年,奉化西坞大地主邬汉根家发生因婚姻问题而起的人命案,宁波“新闻”艺人很快将该事编成《双杀园》,受到农民欢迎。后来越传越广,邬家认为有关体面,起初送钱送米给“新闻”艺人,让他们不要再唱,可是由于民众爱听,所以艺人并没有停止演唱《双杀园》。最后,邬家不得不请奉化县官出布告、下令禁唱这个曲目^[24]。“新闻”艺人顾阿伙唱《拆鸳鸯》过程中的两件事也值得一提。有一年入夏,顾阿伙坐在横河街桥头唱起《拆鸳鸯》。宏亮的唱声传到百步之遥的后桥头於家,於家有一小后生闻声坐不住了,急匆匆赶到横河街桥头,一声不响站在阿伙身旁。当阿伙唱完一段暂停时,他猛地夺过阿伙手中的小锣,“扑通”一声丢到河中,转身就走。突失小锣,弄得阿伙不知所措。这个后生就是《拆鸳鸯》中於阿友的儿子,他听到盲艺人唱他父母亲不光彩之事,一气之下才做出莽撞行为。有个竺姓老人见状同小后生理论:“你父亲是个忠厚的老实人,当时家中不富,全靠横河街众乡亲的帮助,方能与你母亲成婚,这是事实。亮先生唱的句句是实情,何况此事公堂公判,众人皆知,有何唱不得?你不能以怨报德做蠢事,你得赶快把河中的小锣捞起来,方能得到众乡亲的原谅。”^{[25]72-73}又有一次,一个地痞觉得顾阿伙唱《拆鸳鸯》是在影射自己,因而将他打倒在地。顾阿伙大声说道:“邱阿岳赖婚,是大石头头衙门在众人面前公审公判,谁人不知,哪个不

晓?……要让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何况《拆鸳鸯》新闻,县政府也备了案的,我为啥不能唱?”^{[25]74-75}

当然,即使取材于本地,艺人所唱的故事也不免存在一些虚构的成分。如《旱灾记》讲的是浦江上吴村吴无生一家贫困而不幸的遭遇。故事当中,体恤民困、爱民如子的金华知府只身微服徒步到浦江视察灾情,傍晚遇雨,便在凉亭借宿,夜半,一位住凉亭的孤身妇人临产,知府觉得不能坐视,便为她接生。当时连一块破布都没有,知府便撕破内衣包婴儿,取名“天生”,并认为义子,赠以金蝴蝶^{[16]263-264}。又如《借伞记》讲义乌王知县审理一件无头女尸案,因案情复杂,没有头绪,无法结案。后知县夫人外出察访,在船上识破真凶^{[16]263-264}。这两个故事所塑造的知府、知县夫人皆带有理想化的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金衢道情和甬舟“新闻”所唱的“新闻”并不具备当代新闻学所谓的时效性。成熟的道情和“新闻”曲目往往在师徒之间代际相传,即使曲目初成之时,故事还称得上“新近”,但它终究要成为被不断传唱的“旧闻”。实际上,从语义来看,在传统中国民间社会,“‘新闻’一词指的是新鲜的事情或故事,但它的新鲜并不一定体现在新近发生上,而总是要体现在新奇上。”^[26]尽管取材于当地的道情和“新闻”曲目,因缺乏时效性而与现代社会的“新闻”相去甚远,但它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式的故事,民间传说等相比仍独具一格。它不仅与地方社会深度联系在一起,而且带有一定的真实性。这种内容的地方性和真实性,正是浙江“唱新闻”偏离中国曲艺主流的地方。

“唱新闻”的真实性内容与听众、艺人所在的地方社会耦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其他曲艺难以替代的独特吸引力。故事中的地点通常是听众知道的、甚至到过的地方;故事中的人物是听众曾见过或曾听闻过的,即使主人公已不在人世,他们的后人还生活在听众周围;故事的情节与听众的生活经验多有符合,时时提醒他们调节自己与所在的地方社会的关系。这些都使得听众更加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所在的地方社会,更加熟悉自己所在的地方社会,并将情感倾注于自己所在的地方社会,进而深深地依恋她。民国年间宜卢^[27]回忆“唱新闻”时曾说:“我在少时,也曾经几度听过这种新闻,很够味儿,现在回想起来,尚好像有无穷的乡村太平景象,出现于眼前。今年没有旱灾,也没有水灾,乡村农田的收获,闻说是近几年来所没有的美满,在这年头,我于是又憧憬着乡间唱新闻的玩意儿来了。”

四、结 语

从浙江“唱新闻”的组合性媒介结构来看，正是由于身体媒介和乐器功能不足，以及口语媒介在声腔上的贫乏，才导致口语媒介不得不在信息内容上放大、增强自己的功能——以具有地方性和真实性的故事取得相较于其他曲种的内容优势。当然，还需指出的是，浙江“唱新闻”之所以将具有地方性和真实性的新闻轶事作为重要内容，既要归因于其特殊的组合性媒介结构，同时又与当时当地众多曲种所形成的竞争性社会环境不无关系。媒介结构固然是重要因素，但若不存在竞争性环境这一社会因素，浙江“唱新闻”内容的地方性和真实性特征也无法形成。

在特定的竞争性环境当中，任何一种曲艺想要取得生存空间，必须使其媒介在功能上与其他曲艺处在大致相当的水平，或取得优势。由于传统曲艺的媒介一般是组合性的，所以这个组合性媒介结构的整体功能就必须保持在同地域同行业的平均水平线上下。而在这个组合性媒介结构内部，各个媒介的功能却并非一定是平衡的，一种媒介的缺失可以由另一种媒介来弥补，从而保证组合性媒介结构整体功能不失。这就会导致某种媒介在该曲艺中占据相对显著的地位，从而产生某种程度的偏向，如身体偏向、器乐偏向、声腔偏向乃至本文所讨论的内容偏向等。

最后，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同为盲艺人，但其演唱内容却不具有浙江“唱新闻”的地方性和真实性，这该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此问题：这类盲艺人是否身处竞争性社会环境之中？他们所使用的乐器是否简陋？他们在声腔上是否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如果他们不在竞争性社会环境当中，或者所使用的乐器比较丰富，或者在声腔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那么他们便不一定有从当地采集素材的动力。

参考文献：

- [1] 孙悦涓. 宁波象山曲艺“唱新闻”文化生态与社会生态研究[J]. 艺术百家, 2010(6): 152-158.
- [2] 李蔚波. 宁波曲艺志[M]. 宁波: 宁波出版社, 1999.

- [3] 黄旦.“报纸”的迷思：功能主义路径中的中国报刊史书写之反思[J]. 新闻大学, 2012(2): 29-36.
- [4] 李乐. 唱新闻：浙江传统乡村的声音景观和感官文化[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1): 67-71.
- [5] 王远. 金华县续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5.
- [6] 杨鸽声. 金华市曲艺作品选序[C]//章竹林. 金华市曲艺作品选. 澳门: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2003: 2.
- [7] 俞荣梁. 金华市农业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8: 205.
- [8] 姜陇一社员. 春耕到备耕忙姜陇社某些社员还在赌博听走书[N]. 宁波大众, 1957-03-06(002).
- [9] 衢州市曲艺志编纂委员会. 衢州市曲艺志[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 [10] 刘海龙. 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J]. 国际新闻界, 2018(2): 37-46.
- [11] 约翰·奥尼尔. 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M]. 张旭春, 译.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 3.
- [12] 杨慧琼. 肉身即媒介：论基督教的核心传播思想[J]. 国际新闻界, 2011(5): 41-46.
- [13] 路默. 唱新闻的盲者[N]. 宁波日报, 1948-08-18(004).
- [14] 周时奋. 宁波曲艺志序[C]//李蔚波. 宁波曲艺志. 宁波: 宁波出版社, 1999.
- [15]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00.
- [16] 李骅. 金华道情漫谈[C]//浙江省艺术研究所. 艺术研究资料(第5辑). 湖州: 湖州市图书馆藏本, 1983.
- [17] 孙雨松. 改良唱新闻[J]. 抗战青年, 1938(18): 24.
- [18] 吴华. 夏日乡居草[N]. 浙赣路讯, 1947-09-06(004).
- [19] 包江雁, 方长生. 金塘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494.
- [20] 陈心昌. 磐安县文化志[M]. 金华: 金华市图书馆藏本, 1993: 104.
- [21] 周静书. 宁波传统曲艺作品精选：综合曲艺卷[C].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6.
- [22] 前洪村志编纂委员会. 前洪村志[M]. 金华: 金华市图书馆藏本, 1996: 169.
- [23] 浦江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浦江县文化馆. 浦江风物志[M]. 金华: 金华市图书馆藏本, 1984: 93-94.
- [24] 金一毛. 唱新闻[N]. 宁波时报, 1950-07-26(003).
- [25] 乐炳成. 九峰传唱[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0.
- [26] 李乐. 俗曲“新闻”及其书面形式：以傅图所藏俗文学资料为中心[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8, 31(3): 104-110.
- [27] 宜卢. 唱新闻[J]. 民众教育, 1937, 5(4/5): 107-109.

(责任编辑:王锦城)